

中国语言学批评：

行走在文本与文化之间

中国当代的语言学批评，其实是源起于对社会科学批评的反思与反拨这个时代文论新潮之中，它所担负的责任是建立文学观念中的审美之维。

肖翠云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语言学批评：

行走在文本与文化之间

肖翠云●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学批评:行走在文本与文化之间 / 肖翠云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207-08564-1

I. 中… II. 肖… III. 语言学—研究—中国 IV.
H0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8039 号

责任编辑:姚虹云
封面设计:王焱洁

中国语言学批评:行走在文本与文化之间

Zhongguo Yuyanxue Piping: Xingzou Zai Wenben Yu Wenhua Zhijian

肖翠云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30 000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564-1 / I·1124
定 价	4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序

肖翠云是从福建师大完成语言学的硕士学习而考入苏州大学的,但往前看,她又是安徽师大的本科生,她读书时,我还在那所大学任教,早就算是我的学生。安徽师大是一所美丽的大学,位于芜湖的赭山下,山上有黄庭坚当年的读书处,此处松涛竹韵,鸟语花香。我当年入学,走的还是鹅卵石路,一条小道,弯曲有致,沿着它可到山上的一座占地不小的四合院,据说四合院里住过不少近代文化名人,可惜后来被拆,片瓦不存,只在少数人的记忆中留存,随着这些人的或早或迟的离去,这记忆只能留存于纸上的几行字中,干巴巴的,要想恢复那鲜活的场景与可观的景象,已是不可能了。

肖翠云报考苏州大学时,我还挂名在比较文学学科名下招收博士生。我的担心是:以其语言学的背景来读比较文学,可能有两个难处,一是语言研究与文学研究还是有距离的,转而研究文学,怕她三年学习的时间不够;二是写论文还得比较,若与比较无关,名实不相副,不好向学科交代,招她是有些踌躇的。但好在比较文学除了跨民族、跨文化的比较以外,还有一个跨学科的比较,从事文学与语言关系的研究,不妨算是比较文学的一支,这为她的选题留下了空间。结果,肖翠云以优秀的成绩考进了苏州大学,她的扎实的语言学与文学功底,再加上认真的学术态度,在她日后的论文写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做博士论文求的是创新,照我理解,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研究的课题具有创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研究者具有创新的潜质,两个方面的结合,才能真正产生创新的成果。有前一个方面,没有后一个方面,只能说是选对了题目,做坏

了论文;有后一个方面,没有前一个方面,只能说是选错了题目,做苦了作者。

肖翠云在选题时,基本确定要从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结合的角度来做,几经商量,寻求三点的互生性,即课题的出新、作者的原有学术背景、导师的研究方向,最终敲定研究语言学批评在现当代主要是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实践情况。这里会出现两个层面的比较,一个是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比较,另一个是西方的语言学批评与中国的语言学批评之间的比较。这里出版的专著《中国语言学批评:行走 in 文本与文化之间》,就是以其博士论文作基础再进行充实修改而完成的。其中,我要谈谈作者学术背景的重要性。就中国目前从事文学的语言研究的情况来看,研究者中少有语言学研究背景的,这个背景当然不能直接决定语言学批评的某次实践是否必然成功,但缺少这个背景,必要影响整个语言学批评的深度与广度,则是无须讳言的。所以,在语言学批评的队伍中,增加具有语言学背景的学术人才,应当是语言学批评发展的必要途径之一。看看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基本上是由一批杰出的语言学家构成的,他们能产生如此广泛的世界影响,应当与他们所具有的专业背景密切相关。所以,由肖翠云来做语言学批评的研究,有了两个便利的条件,一个是她学的是语言学;另一个是她的硕士生导师谭学纯教授本来就是中国当代小说语言批评的重要实践者之一,这个师承,将会对她的论文写作极有指导作用。我对肖翠云承担这个课题的研究,是充满信心与欢喜的。

这个课题的出新之处到底在哪里呢?这与当代语言学批评家实践与理论建构都极有关系。尽管当代的语言学批评构成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文论界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事件,但对于它的作用的估价不足,对于它的发展脉络的认识不清,对其后续如何发展的估计也相当模糊。因此,通过这个选题若能对上述三个问题有所解答,应该是有功于文论界的;即使只能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恐怕也是不虚此“行”——不虚用一篇论文来讨论一个应当讨论并且值得讨论的问题。

中国当代的语言学批评大概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与当时关于现代派的研究相表里。如当时有一篇讨论文学“向内转”的文章,叫《“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伍林伟),就认为“向内转”所主张的文学转型只是题材上的转

型,而非现代意义上的转型,这现代意义的转型就是语言上的转型,“对进行实际创作的作家来说,最根本的就是掌握新的语言结构能力。现代意识不是存在于作家的主观愿望中,而是存在于作家实际的语言营造组合过程之中。不是抽象地想要说什么,而是实际地怎样说”。作者在这里借用了西方形式主义的文学观,强调新的文学意义的形成不是取决于题材,而是取决于对语言的独特运用。从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从“向内转”开始,中国文论界开始切实关注文学的语言问题,语言学批评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其作用不言而喻,那就是推动了文学观念的进一步审美化,或曰形式化。如果说在性格组合论、主体论的讨论中,文学的审美特性是以重视人的个体独特性来呈现的,那么,到了语言学批评的出现,文学的审美特性才以形式的方式呈现,其中包括了语言、文体、技巧等多重内容。我曾在评述夏中义教授的新时期文论研究时说过:“其实,在新时期的文论发展中,任何对流行文论的反思与反拨,都以接近形式主义文论为走向。这一点也不奇怪。流行文论长期排斥文学形式研究,使得这一领域相当荒芜,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无法回避这一课题。甚至可以说,是否重视形式研究,构成了当代文论建设的标尺,一切无意于此的文论话语,都因缺少创新意识而被视作意义缺席。”(《理论的长跑——〈艺术链〉导读》)夏中义也是早于1985年左右就提出了“诗律”的相对独立性,并将形式视作是不受作品内容必然制约的艺术属性。中国当代的语言学批评,其实是源起于对社会学批评的反思与反拨这个时代的文论新潮之中,它所担负的责任是建立文学观念中的审美之维。其对前期文论的反拨之大,对于整体文论的体系更新之重要,对于今后文论的建设发展等方面来说,都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存在过的并正在发展的某种历史事实,未必会必然地被学术史所承认,语言学批评的崛起及意义,在2000年左右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与承认。以当时一本规模宏大的著作来看,它在研究西方当代文学批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其中涉及精神分析学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解释学批评、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女性

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却独缺形式主义批评与语言学批评这样的标题与内容。这是疏忽吗?不得而知。但形式主义与语言学批评的缺席,说明了它在中国文论界中的地位恐怕还是不确定,或者说还是不被重视、不被欢迎的。可实际的情况是,缺了它,中国当代文化的审美化进程将失去重要的甚至是支柱性的力量。因此,正是针对这样的疏忽,梳理与研究中国当代的语言学批评,具有了补充缺失的价值。肖翠云选择语言学批评来作为论题,成功地完成它,将使当代西方的批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显得更完整、更清晰与更加具有生命力。

如果将中国当代的语言学批评视为发生在中国文论界的一个重要事件,肖翠云的论文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并不简单,这个任务包括三个方面:寻找过程的轨迹,提出属于中国语言学批评的独特问题及后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尽管在三者中,过程轨迹的描述是主要的,但作者并没有放松中国问题的提出及解决,这就形成了肖翠云论文的实际核心其实是:思考的是“语言学批评在中国”到“中国的语言学批评”这一过程是如何转化的,即中国语言学批评独特品格是如何形成的、采取了哪些策略。她将中国批评家的语言形式分析与历史文化分析相结合,视作中国批评家所流露的主导倾向与理论共识。其中,她认为王—川等人从修辞学的角度揭示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互赖关系,谭学纯、赵宪章等从美学的角度阐释文学语言形式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内涵,鲁枢元等从心理学角度解读文本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密切关系,申小龙等则从文化语言学角度揭示语言与文化、思维之间的同构关系,把语言阐释深入到文化阐释和心理阐释的层面,这有力地说明了语言学批评在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它不是西方语言学批评的简单移植,而是中国的创造性接受与重构,所以,它是中国的,是“中国的语言学批评”。肖翠云的论文,其实提出了一个目前大家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即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以后将如何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是如何体现了“中国性”的,这种“中国性”的有效性有多大。她用中国语言学批评的具体实践说明的这个“中国性”问题,由于立足于某一个学科,并进行了真正的深入梳理与研究,因而,她

所给出的语言学批评的“中国性”的某些结论,也就显得切实而可靠。如果我们的文论界,都能这样一个学科一个学科地认真进行这样的专门化的“中国性”的探寻与总结,我们离整体地描述中国当代文论的整体的“中国性”也就不远了。肖翠云在这个方面是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的。我认为这样的专门化的研究是有效的,远比那种宏大的纵论中国当代文论如何接受西方文论又如何体现“中国性”的论文更加深刻,更加符合认识事物的规律性。

最后,我想谈一点自己的感想,近期文论界关于文学的本质有着热烈的论争,有的认为文学是有本质的,这往往被视作文学的本质主义;有的认为文学是没有固定的本质的,所谓的文学的本质其实是建构出来的,这被称作建构主义。展开这样的思想交锋,是文论界活跃的表现,是好事。但我也认为,研究文学,与其去确定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争来争去,还不如去确认文学的要素是什么,认清这些要素在文学创作与欣赏中的作用,认清要素的变迁,认清要素对于读者的影响,可能更能弄清文学是什么,更加便于人们认识文学的诸种性质与诸种功能。其实,文学研究是围绕着诸种要素展开的,那些建立在要素研究上的论著,往往真切,得出的结论也往往长久。而反观本质的论争,某时说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某时说文学是人生的,某时说文学是审美形式的,某时说文学是道德的等等,都有一些道理,又都顾此失彼,不能周全。在我看来,文学其实由三种基本要素构成:人性、故事与语言。人性与人生的概念不同,它是人生中的精华,正是对于这个精华的永恒追寻,构成了作者想创作的冲动。故事与情节、抒情等活动相关联,因为有了故事,才有情节,才有抒情的冲动,将人性变成故事,才好看,才好听,才好传播。但有了人性,有了人性的故事还不够,没有语言,就无媒介,就无载体,所以,人性的故事,通过语言来表现的就是文学。关于人性、故事与语言的研究,构成了文学的要素研究的三个基本方面。看以往的文论著作,把捉这三个基本要素研究的,只要在其中的一个方面有所成就,就有了不朽的可能性,而能够在这三个方面都极有成绩的,就成了文论上的伟大名著。刘勰的《文心雕龙》被称作是“体大思精”,它的成功来自于对文学要素的精细把握。钟嵘

的《诗品》也成为中国诗的奠基作,也是在诗的范围中进行了成功的要素研究。刘熙载的《艺概》很出名,也是要素研究。这三本中国的文论名著,恐怕都没有谈什么本质问题。就西方的文论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研究悲剧,也是走的要素研究的路子,对于悲剧与人性的关系、悲剧的故事与冲突、悲剧语言有着深刻见解,才为西方文论举行了隆重的奠基礼。因此,中国当代文论要想有什么真正的突破与成就,恐怕出路就在回到要素研究,去研究文体、语言、修辞、情节、人性、心理、结构、叙事、象征等具体问题,才能为中国当代学术贡献自己的成就。若还是囿于本质的论争,激烈倒是激烈的,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却未必能够提供切切实实的文论成果。由此来看肖翠云梳理与研究的中国语言学批评的一步一步的发展,由这种发展提炼出自己的问题,并给出自己的解答,未必就能一锤定响,但因为具体、详实、明白,会成为后来研究中国语言学批评的参考与启示的。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何况,一切的文学批评都离不开对于文学语言的分析,即使不是从事语言学批评的,了解与认识语言学批评,也是题中之事,这本书的参考与启示的作用还要大得多。

才知道,肖翠云已经用自己的中国语言学批评的相关成果成功申报了教育部的社科项目,她继续做下去,会有更好的收获。

刘锋杰

2009年11月15日于苏州金鸡湖畔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语言学批评:从西方到中国	(10)
第一节 西方语言学批评概观	(10)
第二节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在中国	(26)
第三节 英美新批评在中国	(36)
第四节 结构主义叙事学批评在中国	(45)
第二章 中国古代文论与语言学批评	(59)
第一节 文质关系的论争及“文”的地位	(59)
第二节 古代诗话词话与语言学批评	(67)
第三节 古代小说评点与语言学批评	(79)
第三章 中国现当代文论与语言学批评	(97)
第一节 20 世纪 80 年代前:语言学批评的蒙昧与 萌芽	(97)
第二节 20 世纪 80 年代后:语言学批评的确立、 发展与深化	(112)
第四章 中国语言学批评的美学视角	(127)
第一节 审美性是文学语言的本质属性	(127)
第二节 文本微观层面的审美化观照	(132)
第三节 文本宏观层面的审美化观照	(141)

2 中国语言学批评:行走在文本与文化之间

第五章 中国语言学批评的修辞学视角	(150)
第一节 语境是修辞的生命	(150)
第二节 文本修辞论阐释的理论构建	(154)
第三节 文本修辞论阐释的批评实践	(160)
第六章 中国语言学批评的心理学视角	(166)
第一节 文本是作家母腹孕育的产物	(166)
第二节 文本是作家个性心理的投射	(171)
第三节 文本是民族集体心理的凝结	(174)
第七章 中西语言学批评的差异解析	(182)
第一节 历史的错位及文化研究的影响	(182)
第二节 中西文化精神及思维方式的差异	(185)
第三节 中西文字及语言的差异	(193)
余 论 中国语言学批评的未来之路	(209)
附录一 文学文体研究	(217)
形同而质异:“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	(217)
文体形式与意义阐释——赵宪章的“形式美学” 批评	(225)
附录二 文学修辞研究	(234)
仿拟/戏拟探源及两者之间的纠葛	(234)
文学终结论:修辞制造的幻象	(248)
修辞幻象:虚构的真实	(254)
主要参考文献	(258)
后 记	(265)

绪 论

20 世纪初西方现代哲学发动了一场“语言学转向”的革命,从语言的角度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认为传统哲学中的很多问题是语言运用的混乱所导致的,语言的误用虚设了许多并不存在的哲学问题。因此,维特根斯坦说“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①。这种转变深刻影响并启发了文学理论界。从世纪初的精神分析学到世纪末的后殖民主义批评,语言穿梭于整个 20 世纪文论舞台,成为备受宠爱的主角。正如伊格尔顿所言:“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已经成为 20 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的对象。”^②应当说明的是,尽管 20 世纪西方文论流派都与语言有着或显或隐、或远或近、或深或浅的关系,但从把语言形式作为文学的本体这一角度来看,主要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批评(包括叙事学)三大家。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把语言、形式、结构奉为文学的本体,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自足的存在,与作者、读者、社会无关,“文本之外无他物”。这是一种典型的“文本中心论”。相对而言,其他的理论流派虽然关注语言,但语言并不构成其理论体系的核心,作者、读者、社会、历史、性别、权力、民族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这些流派的视野。对这三大流派的共同理论倾向,国内学者对其命名也各异。有的取其“形式”,如“形式主义文论”(方珊)、“形式本体论”(刘大枫);有的取其“文本”,如“文学文本理论”(赵志

①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45 页。

②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121 页。

军)、“文本主义文论”(傅修延);还有的取其“语言”,如“语言本体论”(陈晓明)、“语言学文学批评”(唐跃、谭学纯)、“语言学批评”(葛兆光)、“语言批评”(孙文宪)等^①。严格说来,“形式”、“语言”、“文本”虽然名称迥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文学文本是语言编织的产物,必然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形式也是语言组织而成的。因此,语言在三者中占据着更为核心的位置,形式与文本都是语言外化的产物。本书取“语言学文学批评”(简称“语言学批评”)来描述之,除此原因之外,还有以下考虑:

(1)“形式主义”的命名是对传统文论重内容轻形式的反拨,表明三大流派对文学形式的倚重。但“形式主义”是一个带有很强贬义色彩的词语(在中国尤其如此)。“俄国形式主义”的命名是其论敌强加给他们的,他们自己则不愿承认;新批评派试图为自己的理论命名,采用过很多名称,就是不愿意自称形式主义。^②基于此,本书也不采用这个命名。

(2)“文本”是随着结构主义而出场的,罗兰·巴特对作品和文本进行了区分,清除了“作品”一词中含有的主体色彩,宣布“作者死了”,这样,“文本”取代“作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存在。但从结构主义开始,文本的内涵就呈泛化趋势,突破文学的边框,走向了社会文化的宽广天地,形成一种“大文本”观念。用这种泛化的文本概念来命名较为保守的“文本中心论”显然也是不太适宜的。

(3)西方文论语境中“语言本体论”包含三层意思:语言是人类的本体、语言是世界的本体、语言是文学的本体。海德格尔的“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从哲学本体的高度阐述了语言与存在的一体关系;维特根斯坦的“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则表明了世界是语言化的世界。这两种语言本体观必然导向“语言是文学的本体”,认为“语言研究是文学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语言是文学世界存在的本体依据,文学的所有特性都可追溯到语言”。^③因此在

① 语言学界也有“语言学批评”或“语言批评”的说法,但其含义指的是对语言运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或不规范之处进行批评更正,属于语言学范畴。如施春宏在《语言批评的嬗变及存在的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狭义语言批评主要是指语言运用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提出意见加以改正,这可看作消极的语言批评;广义语言批评是指对语言观念、语言现象、语言生活、语用问题等各个方面展开评议、分析、阐发,这可看作积极的语言批评。语言批评的根本目的是建立语用和谐。而我们所说的“语言学批评”是“语言学文学批评”的简称,指的是运用语言学的概念、方法以及理论进行的文学批评,属于诗学范畴,因而两者不是同一个概念。

② 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③ 谭好哲、马龙潜主编《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0页。

“语言本体论”的命名中扭结着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上的本体和形而下的文学意义上的本体,而后者才是三大流派所关注的对象。很多学者在谈论“语言本体论”时指的都是哲学意义上的语言与存在的一体关系。命名内涵的包容性、模糊性使其无法明确地指向某一特定对象,能指与所指的不统一使得“语言本体论”并不是一个有效合理的命名。

(4)以上三种命名都着眼于研究对象:语言、形式、文本,形式与文本都必须以语言的方式来呈现,语言已经内化在形式与文本中,因此,语言、形式、文本是三位一体的,其中语言起着支配性的决定地位,没有语言,形式与文本只能以观念形态的方式存在,正是语言才使得形式与文本从观念形态显现为物质形态。因此,“语言本体论”较“文本主义文论”和“形式主义文论”显得更为合理,但为了排除哲学意义上的语言本体与文学意义上的语言本体的缠绕,本书拟用“语言学文学批评”(或简称为“语言学批评”)来命名。

语言学文学批评不是一个语言学范畴,而是一个诗学范畴,它强调的是运用语言学的概念、术语、范畴、理论及方法来分析文学文本,是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有机结合,目的是使文学批评摆脱社会学批评和传统印象式批评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而具有一种稳定性、客观性的科学精神。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学文学批评”是一个偏正短语,其核心是“文学批评”,表明它的批评对象是文学文本,而不是泛化的社会文本,文学批评应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其修饰语“语言学”表明批评的方法是语言学的,而不是社会学的或心理学的,两者的有机结合就代表了一种崭新的文学批评模式: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学文本。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雅可布逊曾试图建立一门语言学诗学,把语言学与诗学结合起来,但在雅可布逊那里“诗学”常常成为“语言学”的一部分,这又混淆了语言学与诗学的界限,两者的融合不是谁包容谁的问题,而是理论、方法上的借鉴、启迪和会通。另外,雅可布逊的语言学诗学阐释的对象主要是诗歌,诗学虽是文学理论的代名词,但不能等同于关于诗的学问。因此,“语言学文学批评”不等同于雅可布逊的“语言学诗学”,它的批评对象和范围面向所有的文学文本。

首先,语言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文本中的语言形式及结构,突出的是文本语言形式在文学研究中的独立价值,反对把语言形式仅仅当作思想内容的附庸,因此,语言学批评遵循的是本体论的语言观,而不是工具论的语言观。

其次,语言学批评的方法是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结合,它把对文本意义及其社会文化内涵的挖掘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从而摆脱传统印象式批评的

主观性和随意性,使文学批评具有客观性的科学精神。

再次,语言学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语言学理论,把文学文本当作检验语言学理论是否有效的实验基地,而是运用语言学理论及方法来揭示文学文本语言形式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对“语言学批评”内涵的界定与澄清,有利于本书考察对象的确定。首先,由于语言学批评是建立在本体论语言观基础之上的,因此,本书所说的“中国语言学批评”主要是指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文本语言形式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方式。尽管8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学理论或批评也对语言自身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和探讨(如古代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五四白话文运动等),但由于还不具有自觉的语言本体意识,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批评,只能将其看成是语言学批评赖以成长的不可或缺的本土资源。其次,本书所说的“中国语言学批评”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语言学批评在中国”,即西方语言学批评进入中国以后它的发展状态,包括它在中国的译介、传播情况以及国内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其进行的批评、质疑和改造情况。二是“中国的语言学批评”,即国内学者在研究西方语言学批评的同时也致力于探讨中国文学的语言形式问题,并试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批评。这两个层面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第一层面的研究为第二层面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提供了大量的理论资源和经验;第二层面的探讨则是对第一层面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没有后一层面的建树,中国文学理论只能是西方文学理论的附庸者,而难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因此,本书的重点将放在第二个层面,着重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批评是如何产生并构建的。

— —

20世纪80年代初,在思想解放的文化语境中,西方文学流派纷纷涌进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文学观念,这对长期以来禁锢于社会政治批评及阶级斗争哲学之中的国人来说,无异于一场甘霖雨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西方语言学批评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翻译、介绍、传播、阐述、分析、评价到质疑、反驳、改造、重构及实践,这些努力使西方语言学批评在中国文论界占据了至为显要的地位。本书不想对西方语言学批评理论本身再评头论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找不到新的切入点只能是无意义的聒噪。本书关注的是西方语言学批评在中国语境中的生存状况。从这一角度出发的研究文

章及著作并不多^①,具有代表性的是陈厚诚、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②。此书对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引进的历史背景,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以及批评实践情况作了详细周到的论述,是一次卓有成效的整理和总结。但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1)此书的编写体例是按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和历史分期来论述每一理论流派在中国的研究状况的,虽然较为清晰地呈现了各理论流派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但因内容庞杂,未经分类整理,故难以显示出中国学者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展,又有哪些不足。(2)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作为开启 20 世纪西方文论舞台序幕的先行者,在此书中却委屈地做了英美新批评的陪衬者,论者只是在评价英美新批评时才稍带提起了它,对两者作了简要的比较分析,没有给予应有的章节地位。这种忽视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的,在笔者看来都是不可取的。这不仅是因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开启了文学自律性研究的先河,而且它对后来文论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它在中国的研究状况理应受到关注。鉴于此,本书不想对西方语言学批评在中国的研究状况作全景式的描述和分析,而是重点考察国内学者在研究西方语言学批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及所留下的缺憾,并提炼出西方语言学批评的总体特征,进而探究和反思这些研究成果对构建中国自身的语言学批评体系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在研究西方语言学批评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在努力构建一种不同于传统文论的新的理论体系。西方语言学批评对语言自身价值的关注无疑为中国文学批评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空间。20 世纪 80 年代在文学创作界轰轰烈烈的语言实验的促发下,文学批评界把目光聚焦于语言,形成了一股语言学批评的热潮。这股热潮首先从文学语言研究开始,继而扩展到形式、结构、文体以及叙事研究等方面,文学批评从传统的外在研究转向内在研究,文学文本自身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种研究不仅与当前的文学创作紧密互动,从理论上对文本语言实验予以大力支持,而且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延伸到现代、近代以至于古代,从语言学批评的视角对一些经典作品进行重新阐释,挖掘出社会政治批评所遮蔽、所忽视、所误判的东西,使其呈现出崭新之貌。除此之外,文学批评还对 20 世纪整个文学作语言学的巡礼,细致地解析了 20 世纪文学创作及文学活动与语言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这是对传统感悟

① 当然,这类带有综述性质的评述文章本就不须太多,而且,由于受时间的限制,综述性文章不可能“与时俱进”,不可避免地带有滞后性和阶段性。因此,本书在考察西方语言学批评在中国的研究状况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 1980 年至 2005 年这一期间所发表的文章及出版的著作。

② 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年。

式批评和社会学批评的一次有力反叛,它改变了文学批评的方向:把以内容分析为主扭转成以形式分析为主,形成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崭新的文学批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并没有满足于搬用或借用西方语言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来检测中国的文学文本,把中国的文学文本当作西方语言学批评理论的脚本或实践基地,而是积极思考、勇于探索一种既区别于中国传统又有别于西方语言学批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模式。很多学者都认识到西方语言学批评把语言形式拜为文学的本体,对文学文本作精微细密的语言学分析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将文学研究封存在文本的内部,无视文本与外界的联系,又走上了纯形式分析的极端。另外,中国传统的社会学批评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对文本思想内容的挖掘是纯形式分析难以企及的。那么,如何将西方语言学批评的合理性资源与中国传统社会学批评的有效性质素融合起来,就成为中国语言学批评能否确立的关键所在。认识不到这一点,很容易把这股语言学批评热潮看成是西方语言学批评在中国的翻版,看成是一种形式主义批评。如有些学者认为,新时期文论界盛行的这种语言学批评用文本的纯形式分析取代形式与内容辩证统一的分析方法,完全抛开社会历史内容,标榜一种形式批评,因而走上了西方形式主义的老路。这种看法的失察之处在于只看到了这种批评对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的借鉴,而没有看到它在借鉴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改造,因此有片面化之嫌。

那么,如何对西方语言学批评进行改造?如何把中西文学批评中的合理性因素融会贯通起来呢?高友工、梅祖麟在《唐诗的魅力》一书中曾将西方语言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唐诗的阐释中,在精细的剔抉爬梳中让人充分领略到唐诗的魅力。但他们也注意到,唐诗的语意往往很难在纯语言范围内寻觅,其所蕴含的更丰富的内涵使他们“每每不得不超出这种(文本语言)限制”,“从文本发展到背景”。^①因而,背景意图批评与语言学批评就成为《唐诗的魅力》一书中醒目的批评模式。葛兆光高度肯定了高、梅二人对西方语言学批评所作的改造,但是这一改造却潜伏着危险,存在无法修补的理论裂痕。因为,背景意图批评与语言学批评两者“相互消解,彼此干扰:语言学批评希望以精细可靠的规范建立一个标准的分析模式,让文本独立以摆脱因人而异的尺码干扰,但同时语言分析尤其是语意分析又使它不得不引入‘传统’来作参照系或干脆以背景意图

^① 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李世耀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81页。